

遥望那片动人的风景

——青海少数民族青年作家与文学生态

□卓玛(藏族)

青海是多民族聚居地,拥有丰厚的文学传统。继老一代作家格桑多杰、韩秋夫、察森敖拉、鲍义志等人之后,近十几年间,优秀的少数民族作家作品不断涌现,青海少数民族文学的生态显得更为复杂和丰富,呈现出更为宽广的文学面貌。

在小说方面,青海少数民族作家显示了他们编织故事的独特能力。一些青年作家从叙事、结构等层面表现出了一定的探索性,文本的内容和视野体现出了一定的深度和广度。多杰才旦、才旦、梅卓、龙仁青、扎西东主等作家仍保持强劲的创作势头,而江洋才让、万玛才旦、德本加等更年轻的作家也写出了优秀的作品。

近几年,江洋才让投入长篇小说创作,先后出版了《怀揣石头》《康巴方式》等长篇小说。但纵观江洋才让近年的短篇小说,似乎更有特点。在其有关康区的书写中,江洋才让力图使每一个短篇都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但它们之间又具有某些内在的联系,这犹如嘉那玛尼石刻:每一刻力道不同,刻线若断若续,但最终构成完整的六字经文。小说没有塑造个性极为鲜明的人物,也没有缜密的因果联系的情节,而是着力营造一种浓郁的氛围,烘托出特殊的情调,并在其中传达作家的种种体验。小说人物个性暧昧不明、情节有意淡化,成为江洋才让短篇小说叙事性弱化的主要表现手段,成为其文学创作的减法。小说细节的雕刻、诗意图景的放大是江洋才让为了凸显其情调模式的叙事功能而做的加法。这种加减法的结合共同烘托出小说的抒情特质和丰富内涵。

万玛才旦近年来以双语作家身份创作了诸多短篇小说。小说集《流浪歌手的梦》《嘛呢石,静静地敲》集中呈现了作家双语创作的成果。如评论家戴小巢所言,万玛才旦以“关注当下的视野、个人气质的短篇气象、小说叙事的单纯”构

筑了他的小说世界。其“极简主义”的叙事处理能力、思辨性的小说内涵具有极其鲜明的创作个性。以其短篇《乌金的牙齿》为例,万玛才旦围绕“乌金的牙齿”,聚合了“我”和乌金两个人物,通过各自行动序列的展开,揭示出“思辨性”这个主旨,与古老的民族文化心理形成同构。整篇小说用了接近一半的篇幅来细致叙述“我”对乌金牙齿的思索,用这一行为最大化地揭示了主题。乌金和“我”身上都流淌着藏人思维方式的集体无意识。小说精彩之处在于笔端触及了幽微、复杂的人性深处,尤其反映为善思辨的民族性与从不妥协的现代人格的结合。这种思维模式亦构成以万玛才旦小说为代表的藏族汉语小说的内在思辨性。

藏族母语作家德本加近年来创作势头强劲,先后发表和出版了百万余字的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作品。2011年,由作家万玛才旦翻译的短篇小说《人生歌谣》荣获《民族文学》年度奖。评委会认为小说“通过对藏族日常生活准确而富有诗意的描述,将人生的诸多感悟融入流畅的叙述当中,意境深远,令人回味”。2012年,其中篇小说集《没有雪的冬天》、短篇小说集《人生歌谣》出版,同年,德本加作品研讨会在北京举行,评论界体现出对这位母语作家小说创作的极大兴趣。

土族青年作家张正以诗歌创作居多,在其不多的小说家中,其先锋气质得以凸显,“将

一种灵怪奇异、诡谲多端的想象力发挥到经验式叙事无法抵达的想象高度”。评论家认为,张正以隐含现实指涉的语言,为小说输入了想象的活力,“衔接着志异叙事传统的艺术思维”。

回族青年作家冶生福致力于抒写回族生活,其小说《胡壑》反映了在金钱至上观念的侵袭下穆斯林“洁净”思想所彰显出的意义。冶生福的散文也颇有特点,比如在《青茶小志》中,作者以煎茶般沉醉的生命体验,将茶与这片高地上的人们骨血般紧密的联系表达得活色生香。青茶是岁月压制成的风物志,更是情感发酵成的回忆录,文章情性殊胜,在一个个富于现场感的片段中,在点滴、琐屑的书写之间流淌出令人动容的诗意,以恬淡的表情娓娓传达出散文独有的气质。

运用藏语写作的蒙古族青年作家次仁顿珠善于书写藏区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变迁和文化变迁背景下藏族人的生活、情感和困境。其短篇小说《黑狐谷》以敏感的“生态移民”为主题,揭示了牧民成为“移民”后内心情感的激荡,以及由此引发的对于社会、文化等问题的思考。

在诗歌方面,藏族的班果、梅卓、居·格桑、道韩多吉、江洋才让、尖·梅达、久美多杰、昂旺文章、洛嘉才让、阿顿·华多太、夏雄·央巴、华旦、那若、赤·桑华、白玛措、才登、曹有云、德乾恒美、蒙古族的斯琴夫、那仁居格、照日格、土族的阿霞、阿朝阳、张正、衣郎、撒拉族的马丁·翼

人、撒马尔罕等诗人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姿态。下面我以一些诗人为例,谈谈青海少数民族诗歌的创作特点。

马丁·翼人、撒马尔罕形成鲜明的撒拉诗人梯队。撒拉人血液中流淌的突厥文化基因使这个民族更崇尚力量与自由。游牧文化的自由内核赋予撒拉诗人的一种文化积淀的无意识流淌。面对这种无意识,很多诗人选择成为自由徜徉于历史时空中的“行吟诗人”。撒马尔罕的新诗集《清水微澜》集中体现了他近年来的诗歌风格。他擅长在平静的诗歌语言中蕴含激情,擅长在浅唱低吟中回望民族历史,书写撒拉人漫长的迁徙历史和精神体验。

土族青年诗人衣郎善于以坚实的体验构筑其诗歌世界。在他的诗歌中,诗人认真地将感觉与经验细化,以“贴近大地”的写作展开“个体生命与层层累积的历史、鲜活的现实之间的对话,其中既有对苦难的诘问,也有对命运无奈的叹息,渗透着疼痛和依恋相互交织的生命意识”。在诗作《握紧青海高原》中,诗人以时间为经,空间为纬,在经纬交错的一瞬,进行了历史片段的重构:石器时代的陶罐,歌舞祭祀;雨中的德令哈,诗人真纯。然而,诗歌中更多的是对历史个人化、碎片化,甚至吃语式的呈现,每每的灵光一现,组合成青海高原生动的表情。这种立足于脚下这片土地,认真揣摩土地与历史纹路的诗歌写作方式为青藏题材的书写注入了活力。

·创作谈·

我的写作之路

□万玛才旦(藏族)

回想自己最初的写作,真是有点懵懵懂懂的意思。

那时候写下的文字,不是为了交语文老师的差,也不是为了拿到杂志社去发表,想想其实就是为了内心的一种需求。

我的处女作——小说《人与狗》写于中等师范学校毕业之后。那时候,我被分到一个乡村当小学老师,这个学校就那么两个乡村老师、语文、数学、历史、地理、政治你都得教,每天的作业堆得就跟个小山似的,看着心里都有点累。白天学生们吵吵嚷嚷的,很热闹,你不会感到寂寞,你也没有时间去孤独。可是到了晚上,整个学校就你一个人,批改完那堆作业本,一个人闲下来,内心就会时常被一种排遣不掉的孤独和寂寞包围。

那时候也没有电视机,惟一的消遣就是看看书,然后写写东西。写下来的都是自己当时的感受。写完之后就忘了,扔到抽屉里,偶尔想起来就拿出来看看,但从来没有想过拿到什么杂志上去发表。那时候,其实也不知道写了东西还可以拿到杂志上发

表。

后来上了大学,在写作课上把之前写的一篇《人与狗》拿给老师看,老师说你这个可以稍微修改一下投到杂志社去发表。当时不知道该投到什么杂志社,老师说你这个适合《西藏文学》那样的杂志。我问有没有《西藏文学》杂志社的地址,老师说你去图书馆查。这样才去了图书馆,找到《西藏文学》杂志社的地址,把稿子工工整整地抄写下来,认真地认真地装进信封里,写上地址,去了邮局,贴上邮票,诚惶诚恐地寄了出去。寄出去之后,也就忘了这件事。

学期快结束时,收到杂志社寄来的样刊和稿费,在班里引起了一阵轰动,因此自己还着实高兴了好几天。

以后,写的东西就慢慢地多了起来,发表的机会也多了起来。

这时候,写作的状况发生了一些

变化,不像之前在懵懵懂懂的状态下写作那样纯粹了。有时候,确实确实是为了内心的需求而写作的,而有时候却是为了其他——或者只是为了拿了稿费,换取一点稿费,或者只是为了图得一点虚名,或者只是为了给毕业时的综合成绩加加分。

毕业之后,偶尔也会把那些东西拿出来翻一翻,也会被其中的一些东西感动。但更多的时候,你会看到那些其实不是你内心深处真实的写照,你会看到那些东西离你真实的内心有多么的遥远。你甚至后悔曾经写下了那样的东西。

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作为一个依旧的写作者,我深深觉得一个写作者的任务就是尽量写出那些属于你独有的东西,而不是其他。只有那些关于你内心的、属于你独有的东西才是最宝

贵的。每当你写出了那种属于你独有的东西,你的内心的那种需求才有可能得到真正的满足。

而写作的需求不同于渴了要喝水、饿了要吃饭、困了要睡觉。写作的需求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内心的需求,需要我们付出更多的真诚。写作有时候就像对待一个女人一样,你付出了什么样的真诚,她的心里最清楚。

很多人,对待写作的态度很随意。有时候,甚至像是在玩。这会让你的写作走上绝路。

对于我来说,写作是一种高尚的行为。写作时你必须心怀敬畏,心怀虔诚。写作就像是你的内心深处坐着一尊佛,你写下的真诚的、真实的文字就是对这尊佛的无上的供养。这样的時候,你写下的文字才有可能成为你内心真实的写照。这样的文字,也才有可能成为别人的内心的写照,而照亮别人的心。

对于这样的文字,就像一个内心坦然而人在临死前能够坦然面对自己经历的人生一样,哪怕过去了多少年,你也能坦然地面对它。

一个母语创作者的心绪

□赤·桑华(藏族)

手法都是活生生的例子。对于藏族写作者来讲,这些资源是文学之路上的不尽之竭的可贵资料。

如果我们要指出一篇不怎么成功的文学作品的隐晦时,我个人认为,是因为我们忽视了我们所拥有的东西,继而踏上了端着金碗讨饭的道路。如果要问这种认知是从哪产生的?拉丁美洲和非洲的那些作家就是最好的答案。马尔克斯和富恩特斯把自己所拥有的文化观念和价值观很好地利用在自己的文学作品当中,也就是我们所忽视或忽略的那些东西,从而写出了《百年孤独》《最明净的地区》等脍炙人口的作品。像这样的作品还有阿契贝的《瓦解》和本·奥克瑞的《饥饿的路》等等。相比之下,我们的很多作家却过多地应付他人的意愿或别人的爱好取向,失去了自己写作的本意。对此引用马尔克斯的话来阐述再恰当不过了,他说:“用他人的标准解释我们的现实,只会让我们变得越来越陌生,越来越拘束,越来越孤独。”

文学应积极地关注本民族人民的命运。藏族民族信

仰佛教,而佛教的核心价值是慈悲。作为一个藏族作家,把这些清澈的核心价值观之水引进到文学的田野上是我们不可妥协的责任。此外,藏族民族是一个十分注重缘起因缘的民族,不管做什么事情都很讲究因缘。所以,也应写出充满内在的因缘或祈愿的作品。总之,藏族文学必须要有自己的特点,力求充分展示藏族自己的价值观念。

作为母语写作者,我们的读者并不是很多。也无从谈起大市场和经济收入。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我们是一群爱文学的人或把文学视为自己理想的人。文学是无法用谎言来完成的,它是融入在我们灵魂及生命中的高贵的血液。远离文学功利性的母语文学是非常接近文学的原生状态。所以,哪天在藏区出现像拉丁美洲那样兴起文学爆炸的浪潮时,本人坚信那一定是母语文学。

母语是祖先留下的智慧之门,也是通向智慧之门的

光明大道。所以,我会坚守这片母语创作的金色家园。

过千辛万苦的创造性劳动而获取的宝贵的“金玉良言”。

我曾经这样理解诗歌:诗歌是“无中生有”的产物,诗人从事的事业就是“无中生有”的事业,显然,从“无”到“有”的过程,就是创造。缘此,真正的诗人和诗歌都是非常稀有珍贵的,因为诗人写诗的行为极其类似“造物主”惊心动魄的“创世工程”:一切从零开始,一切需要造出来,并一道说命名。也因此,真正具有创造性的诗人和诗歌都是伟大的。

对于“正在地球‘第三极’——青藏高原封闭而孤绝地写作着的人,我所拥有的经验显然同其他地域中的诗歌书写者大为迥异。这里广袤、浩瀚、博大,气势非凡,但也更加荒凉、闭塞、孤独,空空如也。写什么及怎样写的问题,也即内容和形式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每每如此,我就会打开那些如星辰的经典,它们有时会告知一些管用的经验,我欣喜欲狂,但更多时候,我却一无所获,怅然若失。因为各个书写者所处的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有着很大差异,我们每天耳闻目睹的信息,乃至呼吸的空气、做的梦,都是不一样的,怎么能生活活剥他的经验呢?显然是不能的。那就得脚踏高原苍莽荒凉的大地,头顶高原宁静寂寞的蓝天,一步一步跋涉探索而前,挖掘积累经验,创造并形成真正属于自己的鲜活经验,找到适合于这片山川大地,也适合于自己禀赋气质的形式和语言。惟有如此,才能进行有意义的写作。

有人说,是俄罗斯大地一把抓住了叶赛宁,让他为俄罗斯大地深情歌唱。叶赛宁就是俄罗斯大地优质的喉嗓和嘴唇,没有夜莺般美妙歌唱的叶赛宁,俄罗斯大地就会黯然失色。诗人昌耀说:“我是风雨雷电合乎逻辑的选择”,“诗人本是岁月有意合成的琴键”。青藏高原一把抓住昌耀,让他唱出了美丽的歌曲。在他的杰出歌唱之后,还会抓住谁呢?我,或者你,会是她中意匹配的“选民”吗?那是不得而知的。

2009年6月4日,朝阳把雪山的冠冕涂成金色,雪山非凡地展示自然王者的气度。宿留于此的摄影家被这一美景撼动,屏气宁息,调整焦距,定格这一美丽瞬间。这个时候,年老的牧民久美多杰,坐在自家的卡垫上。他喝进一口茶,吐掉嘴里的茶叶,然后把碗里的余茶泼在地上。他气定神闲,拿起放在窗台上的军用望远镜向窗外的山上望去。他“呀”地发出惊呼,嘴里喊道:“雪豹!雪豹!”他清楚地看到一只雪豹出现在山脊。“多少年了,雪豹又回来了!”老人热泪盈眶,没有发出“豹子为什么会来到这么高的地方”之类的感慨,而是缓缓地将从怀里掏出我交给他的录音笔录音,他自顾自地说话。许久,当他把录音笔搁在窗台,再次通过望远镜寻觅雪豹的踪影,可它却不见了。

那天早晨,年老的牧民久美多杰和年轻的摄影家,以及他的牧民儿子约说了好长时间的话。当他们离去后,他依然坐在卡垫上。大约过了半个小时,他突然翻起白眼,呻吟几下,头一歪,便离开人世——“脑溢血”,牧民们说他死得毫无痛苦。

那支录音笔又回到了我手里。可它是损坏了的。很长时间以来,我没有尝试去修复它。

我知道这里头记录的是故乡的时光。一个老灵魂的诉说,将使它达到沸点。那些熟知的事物在慢慢走开;那些陌生的随着时代的推移好像躲到了灵魂的背面。而我的文学就是要记录和再造这些事物(事件),建立虚构的真实。

久美多杰的灵魂走了出来,在梦里,他对我说:“你为何不修复录音笔,那里面有我很多重要的说道。”

对于亡者托梦,确实不能忽视。我把录音笔交到电脑修理铺去修复……久美多杰坐在乡间的一块石头上,讲起了他的故事,这片康巴大地上发生的许许多多的故事。我知道,在他学会使用录音笔之后又做了大量的补充。那些土得掉渣的语言,显现朴拙之美,原来民间叙事这般精妙。当然,那是老牧民久美多杰说道的一贯特点。老牧民久美多杰,身穿皮袍,脸色黧黑,皱纹随着使用录音笔的次数而不断增加。这新鲜玩意儿,有时还得他初中二年级时就辍学的牧民儿子帮着使用,这样,他才会玩得熟练起来。

“那么多的素材,写小说的素材,被我灌到录音笔里,你不可能把它浪费。”久美多杰活着时,坐在一块石头上,嘴唇发干,说话一本正经,“自我拿到录音笔的那一天,我就想着你最终会永远拿走它!”他呵呵地笑,露出牙齿,那残缺的牙齿豁口挂着肉丝……

我在努力地思考文学与这片土地的关系,这是宏大的命题。美国作家福克纳一生都在写一块邮票大小的地方,而他最终在《喧哗与骚动》中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另一片天地。那么久美多杰的诉说(如果他代表的是族群的记忆),与我的个人经历,头脑里储存的对于这片土地的人文感知碰撞,我不知会产生什么样的化学反应。不妥,“化学反应”像是在鼓捣各类试剂、添加剂,而创作的神秘性,就像拧动冰冷的把手,门被打开,扑面而来的却是满屋的炽热。那种不可预见性,比宿命更具内涵。

“不是吗?我的族人一开始并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他们追逐一座高坡。这座高坡越来越大越来越高,直到他们的眼中出现珠穆朗玛!野牛开始被驯化,游牧成为生活最主要的调子。强大的吐蕃帝国被缔造,藏传佛教盛行后,慈悲的花朵,一朵一朵在藏人心里打开,甘霖四溅……”老灵魂久美多杰,真切地坐在我屋子的一角,放在桌上的暖瓶和茶缸一点也隔不住他的声音。

他说:“录音笔该修好吧?明天,不妨听听。”

录音笔打开:这是一个老灵魂的隔世诉说。他坐在乡间的一块石头上,发出的却是世界的声音!

诗之思

□尖·梅达(藏族)

心灵的祈祷所产生的。不论你是否承认,我们都服从于自己的天性,而天性依附着自己的才能和志向。

普遍意义上的诗歌,或特殊意义上的诗歌,那仅仅是一次从我们灵魂深处对自己人生祈祷所采取的形式之一。我认为,当自然景物、社会事件引发了诗人的某种瞬间的冲动时,诗人的智慧在发光,那些以音乐形式出现的词语就像开苞的花盛

开在原野,奔流的河涌动在峡谷,一切都显得那么自在,顺眼而多情。藏族古代的诗论认为,诗歌是一种听起来顺耳、忆起来勾魂的词语的组合,诗不是书面文学这个领域内的附属品,而是更为广阔的语言艺术所锤炼的,就像是唱歌。“当我们读诗的时候,艺术就这么产生

了”,西方艺术家这段为艺术而艺术的论点,和中国古代诗歌所呈现的精神是默契的。

我始终认为,诗人写诗时,似乎有两个人跟他作诗有关,一个是诗人清醒的自我,而另一个则是他必须向之求问的祈祷或自然界中某种神秘气息带来的天使。诗歌是直通心灵的,在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它是直接,最短,直达你的痛或痒,可以深入入人的肉体和精神。

诗歌,无论是描摹事物还是表达情感,都必须以真实的信仰为本,用精练的语言,传达出诗人内心对事物的神秘感觉。诗歌不仅是语言,关键是要进入所表达的事物的本身。过多的地构造词语,会冲淡事物本身的神秘感。萨特曾说过,词语只是吹过事物表面的风,它只是吹动了事物,但并没有改变事物。

在我看来,诗超越了一切的事物,像一幅美丽的绘画,其色彩从细节来看显得混乱,然而却能大胆地面对事物本身的美一样。

老灵魂的隔世诉说

□江洋才让(藏族)